

晚年钱锺书：“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”（下）◆ 钱之俊

钱锺书这些被拿去拍卖的私信，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是金额的问题，主要是私信的内容被别人误读和利用，一些不适宜公布的私论被拿到桌面上来，使“一束矛盾”（钱的自嘲语）的钱锺书形象凸显了出来，让钱家人尴尬，让钱锺书的公众形象受到质疑。杨绛先生认为，钱锺书许多随手而写的书信，行文难免月旦人物，属于自己隐私，现时发表未必合适。她举例说，凡收到寄赠著作，钱锺书先生回信致谢，自然要以赞语相加。但他的赞扬不一定是对书的全面评价，他经常要附上一句“容当细读”，表明他还未能及时细读。宋以朗认为他父亲与钱锺书的这些来往通信是“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”，可能会整理出版，也可能悉数寄还杨绛先生。因为他有顾虑：“我爸爸与钱锺书的部分通信，若公开会得罪不少人，内容多是讨论钱锺书对他人的看法，显示出他看不起其他学者的态度。”钱锺书自己对书信在别人文章中被公开引用和刊布，生前曾表示过不满：“拙函示众，尤出意外；国内写稿人于此等处不甚讲究，倘在资本主义国家，便引起口舌矣。”“现在出版法已公布，此事更非等闲。我与弟除寻常通信外，并无所谓‘墨宝’，通信如此之类……皆不值得‘发表’。‘No can do’, 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. (大意：书信示众就像洋泾浜英语的用法一样离谱)”可是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”，搬出“出版法”也属徒劳，根本不是他的意志能左右得了的。

钱锺书的处世方式在他的私信中一览无余，在已公开发表的信中早已不是秘密。夏志清认为钱：“写信太捧人了，客气得一塌糊涂。”“待人过分客气”。尽管如此，有人置之一笑，有人却将其奉为圭臬，以之炫人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在一次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评审会议上，有位老师推荐了一本“文学史”书籍，并且说这本书已经有了钱锺书等先生的赞美和推荐。那位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钱锺书就腾地站了起来，满脸通红，大

声说道：“我父亲没有推荐。”这句话使推荐人极为难堪，他掏出三封信放在桌子上，表示并没有撒谎。有人现场就把信翻开细阅，发现其他人是说了赞扬的话，但钱锺书的信正如杨绛所言，一大半是客套话，最后是以“容当细读”结束。大家认定钱锺书的话不是推荐，因为他还没有看呢。钱锺书写信会礼节性、习惯性地尊称对方为“兄”，署名曰“弟”，不管对方是同辈人还是晚辈，有不知深浅者就自以为学问了得，沾沾自喜，传为笑柄。

“浮名害我”

复信过多、过勤，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，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，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，苦不堪言，耗费了他大量精力、心力和时间。他在给友人信中说：“客多信多，干扰工作”。（1982年与许渊冲信）“老来岁月，更无闲气力作人情。而书问过从者不乏，甚以为苦。故戏改梅村语云：‘不好诤人憎客过，太忙作答畏书来。’比年多不作复，客来常以病谢。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，‘学得无愁天子法，战书虽急不开封’。”（与吴忠匡书）“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，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、作序、题词之类，日必五六，虽多搁置不理，而中有年老境困、其情可悯者，不得不稍效绵薄，并作复书。”（1983年11月22日致宋淇函）“十一年来，衰病相困，愚夫妇皆遵医诫，谢事，只恨来信太多，亦多懒慢不复。”（1992年与李黎书）

宋淇曾帮钱锺书想出“逐客书”一计：“先生写好一封信，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，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，最后签下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，其尺寸大小即依函副本，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，高一点。寄来后，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。”但钱锺书谢绝了：“倘以印就 form (格式——编者注) 作‘逐客书’，必召闹挑衅，且流传成为话柄，由话柄而成为橛柄。畏首畏尾，兄当



1980年版《围城》

笑我为 moral coward (满口道理的懦夫——编者注)也。”（见宋以朗文），有人还建议钱找助手帮忙写信，他说：“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，但是光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，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……这对年轻人是一种‘奴役’，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‘大师’，可以享受这种特权。”

钱锺书的身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可，那时正值壮年。但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历经批斗、下放干校、打架、“逃亡”等诸多不幸，加之老年人的常病，使他的身体渐差。哮喘、喉炎、肺气肿等都是老毛病，睡眠也不是很好，后期还患有前列腺炎，时常起夜。每年最难度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，以及立冬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。每次一得

感冒，必然引起哮喘，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。但在“文革”后期，在身体状况差、居住条件根本谈不上（学部办公室）的情况下，他仍坚持整理出皇皇巨著《管锥编》。此书出版后，他尚有宏愿：“初计此辑尚有论《全唐文》等书五种，而多病意倦，不能急就。”（1978年1月作《管锥编·序》）1978年他在给郑朝宗信中也说：“假我年寿，尚延续论《全唐文》《少陵》《玉堂》《昌黎》《简斋》《庄子》《礼记》等十种，另为一编。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。”可是在《管锥编》出版后的二十年内，虽然生活无忧，声名鹊起，他却再也没有完成大部头著作，只是对它进行了增订，留下了一堆犹如天书的手稿，不能不说是学术史的重大遗憾和损失。前文估计流布于世的钱氏信札有两万封，以保守一万封每封信平均350字计，也撰写了约350万字。没有留下著作，反而留下是非，这对晚年惜时如金的钱锺书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个人生遗憾。

有人曾问钱锺书：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后面的《管锥编》，他无奈地说：“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，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。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，许多事情都拿不定，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。我对人生的看法是，眼光不能放得太远，从某个意义来讲，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。”（彦火《钱锺书访问记》《记钱锺书先生》）《围城》重印后，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。他说：“兴致也许还有，才气已与年俱减。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，那只会留有遗憾；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，那就只有后悔了。遗憾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，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，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、开脱或宽容的，味道不好受。我宁恨毋悔。”还是在私信中，他对虚名的利害发出了切身的感叹：“虚名之带来实害，如是如是！”（与沙予信）“浮名害我，不得清静！”（与臧克和信）

摘自《同舟共进》微信公众号

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

游玉云



凭着侦察兵的机灵，找到了某部招待所。但是眼前的一切，使他心急如焚：伯父伯母可能凶多吉少。他跳上废墟，带着哭声大喊：“大伯！金大刚！”

“喂！我在这儿！”一位年过半百的山东男高音答道。金志勇循声看去，一向身材魁梧的大伯，现在瘫在一堆碎砖丛中，紧靠身旁倒塌的墙壁一侧，伯母两条失血的胳膊又伸着。金志勇哇地扑上去：“伯母，您死的好苦啊！”伯父抱住他：“好侄子，别哭了，我已哭了一天一夜了。”

“俺不哭！大伯您快到安全地带去，我走了！”金志勇洒了一把泪。“你去哪？”伯父问道。“俺救人去！”金志勇咬着牙走了。

黑色帷幕罩上了天空，手电、蜡烛、煤油灯、柴火交叉发出点点光亮。指挥排长汗流满身地找到了金大刚的住处：“首长，我奉团部之命，找金志勇归队。”金大刚看了看身着“四个兜”干部军服的青年人：“志勇下午就走了，怎么还没归队？”排长嚷嚷道：“首长，我没有尽到责任。是我答应给他四小时来看看的，现在快一天了，超过了一天我和志勇都要作违纪严处的。现在全团不少人找他，如果今夜12点仍找不到他，就得报告上级。”排长说不下去了，转身就走。

“排长……”金大刚欲言又止，对着排长的背影“唉”了一声，作为军人，他明白侄儿的行为意味着什么，应该尽快寻找侄儿归队。但是在这瞎灯黑火的灾区，到哪儿找呢？

正在金大刚愁眉不展之时，小姨子来了，她双眼红肿，慢声细语地说：“俺爸和妈都没了，是志勇帮我埋的。”小姨子话未完，金大刚霍地立起：“乱弹琴，快带我去找志勇！”小姨子第一次发觉自己的姐夫如此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金大刚见到侄儿，像是被蝎子螫了一下：“回去！快跟我回部队去！”

金志勇腰部和腿部受了数处伤，走起路来一拐一瘸，非常吃力。金大刚肩部划伤，臀部被砸过一次，心中又有失妻之痛，走起路来更显老态龙钟。约莫走了半个小时光景，侦察班长忽地坐在地上，不愿走了：“大伯，这里离部队营地足有十里，俺走不动了，随他们怎样处置吧！”

5.“绝对秘密”的电报

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，苏联远东军从1931年的6个师增加到1936年的16个师，并在苏满边境全线构筑防御工事。1936年苏日关系日趋紧张，8月，日本广田内阁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，11月，日本同德国签订了《反共产国际协定》，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，对苏联构成包围的态势。

正是在这种东西夹击，大战一触即发的背景下，苏联鉴于西线不安定的情况，更担忧东线危机，即日本对苏联的突袭。要摆脱东线危机，苏联只有扶助中国，以牵制日本。因此，从共同的意识形态出发，也即从共产国际反对德、日法西斯联盟的需要出发，共产国际更愿意扶助中共，使其壮大，以解苏联东线危机之困。

有了这一基础，共产国际无论出于国际主义，还是民族主义的考虑，都会批准中共制定的《宁夏战役计划》。因此，得到中共中央的求援电后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取得了斯大林和苏联军方的承诺后，迅速回电表示同意向红军提供军事援助，并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宁夏和甘西的作战计划。电称：“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，同时，坚决的指出，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，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。”

共产国际的来电，更加坚定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发动一场大战役，拓展根据地信心。于是，1936年9月14日，张浩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、毛泽东就占领宁夏的部署联名以“绝对秘密”的电报致朱德、张国焘、任弼时：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，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，即可给我们以帮助，“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，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。拟作如下部署：一、……；二、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、静宁、会宁、通渭地区，控制西兰大道，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，阻止胡宗南西进，并相机打击之，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、中卫南部及宁夏堡之线，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……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，不使胡宗南切断，并不使妨碍尔后一、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

动”，至于占领甘肃西部，候宁夏占领，取得国际帮助后，再分兵略取之。这就是中国红军准备以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北部，四方面军夺取宁夏南部的《静(宁)会(宁)战役计划》。

共产国际批准这一战役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，是其对当时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加的一个筹码。其时，由中共领导人周恩来、秦邦宪等与国民党领导人陈立夫、张冲等正在

谈判，但进展不大。按照沈志华教授的见解，共产国际坚持中共中央必须要求较高的要价，以确保党和红军在国共两党妥协中能够保持有利的地位，绝不能屈从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。为此，当中共中央汇报了部队在陕北甘北地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之后，斯大林很快即批准通过外蒙古，向中国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的援助。正是莫斯科的这一援助计划，催生了1936年10月的《静会战役》。红军三大主力齐集甘北，准备西渡黄河，北上绥远，直趋外蒙边境，接取苏联援助。

1967年1月，笔者在上海南汇县老港公社的一间破屋里，抓到一本残页的“四旧”图书，打开一看竟是西路军将士血色如丹的回忆录（内部发行）。斯时，东海前哨西风凛冽，草木凋零，笔者蜷缩在屋角手捧破书，产生了一个少年的恐怖悬念：难道红军吃过这么大的败仗吗？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笔者在茫茫人海间，竟然发现了上海仅剩的两名西路军幸存者：一名是原上海市人大常委、邮电管理局局长何永忠，他随军西征，与数十倍我军的马匪浴血搏杀，终于突破重围；另一名是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谭守贵，他在极其残酷的战斗中不幸被俘，然其身陷敌营，却宁死不屈，壮怀激烈，最终回到了党的怀抱。

由于回忆往事的两位西路军幸存者，仅仅是西路军的一般军官和士兵，因而他们不可能知道高层机密，只能理所当然地将满腔怨愤泼向张国焘。其实，当年红军组成西路军的命令是由中央军委（当时称中革军委）决定的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关于西路军真相问题的提出，直到2005年春节公开播放10集文献电视片《李先念》而最终解决，历时20多年。

西路军幸存者备忘录

秦维宪

